

他从虔诚的基督徒成长为共和国中将
毛泽东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他被誉为“现代华佗”
最后,他因暴露林彪吸毒隐私被迫害而死
一生传奇又令人扼腕叹息

傅连璋从基督徒到共和国

■文 / 屈平

弃教入党 追求革命

1894年农历中秋,在福建长河县城外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传来婴儿嘹亮的哭声。没有人想到他日后能成为将军。他就是傅连璋,字日新。傅连璋的父母信奉基督教,所以他一出生就受了洗礼。傅连璋长到十几岁时,在当地福音医院内科医师英国人希布莱尔的接济下,考取了亚盛顿医科学校。

傅连璋24岁时,即1918年,经过严格考试,成为汀州红十字会的主任医师。1925年“五卅运动”后,福音医院外籍医生撤走,傅连璋当了院长。这年年底,他结识了在闽西建立党组织的龙岩教员邓子恢,思想开始倾向革命。傅连璋成为名医后,国民党曾表示愿委以少校医官处长,他没有答应。红军于1929年到长汀后,毛泽东等人与他结下深厚友谊。

1933年,傅连璋举家迁到红色之都瑞金。1934年10月,在他的坚决要求下,被批准带病参加长征。在漫漫的长征路上,他与其他医务人员一起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利用仅有的极为简陋的设备和工具,为负伤的战友手术、包扎。由于长途跋涉、条件艰苦,红军官兵很容易患痢疾、疥疮、疟疾和腿部溃疡等病症。傅连璋利用自己多年积累的

经验,提出预防方案,采取多种办法,缓解和祛除战友的疾苦,使许多人摆脱了病魔的威胁,终于走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

到达陕北延安后,傅连璋担任中央总卫生处长兼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长。在那里,他与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成了好朋友。白求恩在延安只住了3个星期就去晋察冀边区,临行前得知他患有严重的痔疮,还主动为他做了手术。白求恩的精神和事迹,直接促使傅连璋写下了入党申请书。1938年9月7日,由毛泽东、陈云介绍,傅连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一个基督徒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当时,到延安访问的外国记者感到好奇:一个信奉上帝的人,居然甘愿放弃优裕的生活参加红军。他的传奇经历在西方媒体上披露以后,对外界了解中国革命起了很大作用。

1940年,傅连璋荣获朱总司令亲笔题写的“模范妇孺工作者”的称号。在傅连璋50岁的时候,中央在延安为他举行了祝寿会,《新华日报》还专门发了消息。1945年,中央军委成立总卫生部,傅连璋出任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担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军委总卫生部(后改为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和中华医学会会长等职务,当选

为党的“八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

医术高超 屡建奇功

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与国民党军在瑞金、会昌等地激战,傅连璋在汀州救治了300多名起义军伤员。傅连璋曾写过《南昌起义的伤员》一文,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八月中旬,听说起义部队正在南下,受到国民党钱大钧部队的追击。估计很快就要打仗,我想应该赶快作好接受伤员的准备来支援起义的革命军,就马上和汀州全城的医生们约好,有伤员来,就以福音医院为中心,成立合组医院。那时,我还在几个学校担任校医,就又约好了许多教员和学生来担任护理工作。

过了十多天,有个扎武装带的军官来找我,说是起义部队的副官。他一说明来意,我就说:“早已准备好了!”并带他在医院内外看了一遍,告诉他哪儿是手术室,哪儿安置伤员。那位军官听了,高兴得一个劲儿说好。

八月下旬,起义军和国民党部队在会昌,先后打了两个大仗。起义军的三百多个伤员被送到汀州来。会昌离汀州有180里山路,那年气候又特别热,许多伤员伤口都化脓了,必须赶快开刀。可是,能够动手术的外科医生只有两

中将



1943年,延安中央医院院长傅连璋(右)
与苏联外科医生安德列·阿洛夫合影于延安

个,我学的是内科,外科也懂得些,凑上去也才3个人。3个人要给300个人动手术和进行其他治疗活动,真是紧张得气都透不过来。不过大家热情都很高,白天黑夜连着干,从没一个人说累。这时起义军已经开到汀州来了。在病房里也可以听到大街上整齐的步伐声、口号声和沸腾的欢呼声。我们一听到这声音,心中就像擂起鼓来,激动得很,谁都想到外边去,哪怕看一眼也好,可是,谁又不愿离开伤员一步。

恰值当地天花流行,对部队形成最严重的威胁。傅连璋马上提出建议,给战士们普遍接种牛痘。毛泽东、朱德不仅同意,还专程到福音医院去当面道谢。考虑到赤白拉锯的复杂环境,毛泽东要他保留教会医院的招牌。后来国民党占领汀州时,住在福音医院的几十名红军重伤员受此掩护得以幸免。

傅连璋与毛泽东来往密切,在红色根据地受到包围和封锁的情况下,毛泽东拜托傅连璋化名“郑爱群”,在汀州订阅了上海《申报》、《新闻报》和广州《工商日报》、《超然报》,傅连璋通过地下交通线不断地把报纸送到瑞金给毛泽东阅读,为毛泽东及时掌握时局提供了参考资料。

当时,红军虽有几所医院,却很简陋,连显微镜都没有。红军长征时,傅连

璋负责中央保健。途中药品用完后,他便利用基督徒的特殊身份,在沿途的教堂找药,解了燃眉之急。后来,傅连璋索性把福音医院迁往瑞金,改为中央红色医院。因傅连璋不会骑马,中央特许他坐着轿子进了瑞金。在苏区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傅连璋用个人多年积蓄的4000多块银元,到白区购买了很多急需物资。

在红军时期,傅连璋堪称医务界的权威,从生死线上拉回许多著名的将领。陈赓在南昌起义时任营长,南下时腿部受枪伤,经傅连璋治疗,不仅保住了生命,也保住了腿。当时陈赓因流血过多,脸色焦黄,身体非常虚弱,伤腿肿得很粗,红而发亮。每次揭开他的被单,傅连璋的心紧缩起来。傅连璋记得,替陈赓治疗伤口时,他不但不叫一声痛,还蛮有兴致地和护理员说话,病房里充满着他朗朗的笑声。为了挽救这样一位年轻、勇敢、有才干的革命军官的一条伤腿,傅连璋采取了“保守疗法”的方针,每天消毒,用夹板固定,同时把新鲜牛奶让给他喝,增强他的抵抗力。总之是想尽种种办法,避免截肢。在持久而谨慎的医疗护理之下,陈赓同志的伤腿终于被保了下来。为了这份友情,陈赓直到1961年去世前夕,还叮嘱家人每年中秋节不要忘了给傅医生祝寿。

那时,起义军二十军三师政治部主任徐特立正患重病,也住在医院附近老古井旁边的一座楼上,傅连璋也经常给他医治。徐特立烧得很厉害,加上年纪大了些,身体也显得虚弱。但是,他病稍好以后,常爱找傅连璋谈话,而且很谈得来。当时徐特立已经50岁了,傅连璋才33岁。不久部队南下,有的留在福音医院里继续医治,以后也陆续出院归队了。陈赓带着没有痊愈的伤腿,徐特立带着才退烧的身体,也走了。但他们乐观、坚定的笑容,清朗、有力的话语,给傅连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被敌机炸伤了腹部,红三军团政委蔡树藩和红十二军军长武中豪等在反围剿作战中负伤,都是经过傅连璋救治而痊愈的。毛泽东与贺子珍有了儿子毛毛,还是傅连璋亲自接生的。长征前夕,毛泽东在江西于都患了恶性疟疾,高烧不退。傅连璋骑着骡子从瑞金梅坑走了180多里到了于都,3天之内手到病除。病愈之后的毛泽东高兴地对工作人员说:“我们现代也有华佗,傅医生就是华佗。”他还特地叫警卫员煨了一只老母鸡送去,以示感谢。这次抢救成功,保证了毛泽东对长征的指挥与领导。

傅连璋除了给中央首长、战士和苏区群众看病,还给红色医务学校学员讲

课。他编了外科、内科、急救、处方、药理学、绷带学等6种讲义,发给学校和红军部队。因根据地医药保障非常困难,他就地取材,用中草药、民间验方防病治病。比如用大蒜治痢疾,用花椒水或茄子秧水洗脚治冻疮。长征过雪山时,部队普遍没有棉衣,他想出了用吃辣椒增加御寒力的方法,挽救了许多战士的生命。

坚持原则 得罪林彪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毛泽东亲自找林彪谈话,希望他挂帅出征。林彪说他老出虚汗,四肢无力,头晕眼花,睡不好吃不好,拒绝出征。毛泽东对林彪的健康十分关心,指示时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的医生傅连璋组织第一流的专家组为林彪的健康状况会诊,还指派了萧华同志代表中央负责这项工作。毛泽东亲自出面,兴师动众,调兵遣将,花这样大的力气,给一个部下会诊治疗,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毛泽东的这番好意,反而使林彪夫妇慌作一团,因为想在这些专家面前蒙混过去,比登天还难,并且林彪一直都在吸毒。林彪夫妇一琢磨,觉得只有傅连璋一个人能搭救他们,但林彪又知道傅连璋不讲情面,于是决定“死马当活马医”。第二天叶群登门拜访,求他帮个忙。他为难地回绝了叶群的无理要求:“我自己不好写这样的证明。这次给林总检查身体,是主席的指示。等会诊之后再写诊断报告吧。”

经过检查,并没发现什么要害的病症。如何写检查结果报告,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傅连璋十分为难。他思忖了再三,终于打定主意,对毛主席和党中央负责,实话实说。他根据各位专家检查的结果,写出一份科学的检查报告,直接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一看报告,心里完全清楚了。他也有些为难,直接地、面对面地向林彪夫妇提出戒毒,这话也不好说出口。他沉思良久,决定通过傅连璋之口,把自己的意见暗示给林彪。但不久,林彪吸毒问题在党内的高级领导层,还是成了个公开的秘密。为了林彪的健康、威信和前途,也为了党的事业,毛泽东

随即书写了一首曹操的诗《龟虽寿》送给林彪:

神龟虽寿,犹有竞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毛泽东欣赏这首诗中的积极进取精神、不信天命,要自己掌握命运的朴素唯物论思想。以此诗相送,就是要提醒林彪戒毒,不要长期称病、小病大养,不能不说是对林这种行为的规劝和含蓄的批评。

林彪看信后,气得不行,对叶群愤愤地说:“傅连璋在背后捅了我的刀子,他在主席面前告我的状了。”

群魔当道 含冤而死

1959年彭德怀被罢官后,林彪篡夺了军权,于是开始向傅连璋下手,叶群更是跃跃欲试,恨不得立即将傅置于死地。他们把亲信总后勤部的邱会作叫到家中密谋,第一步先把傅连璋赶出北京,送到福建老家“休养”,然后再慢慢收拾。由于傅连璋一直负责中央领导的医疗保健工作,邱会作不敢贸然下手,也找不到把他赶出北京的理由,只好暂时作罢。

1966年6月,总后大院贴出第一批大字报,其中就有批傅连璋的,批他写的两本书《养生之道》和《在毛主席教导下》宣扬活命哲学,吹捧自己。第二天,大院里全部换成批傅连璋的大字报,这当然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预谋。大字报把傅连璋奉毛主席之命为林彪检查身体说成是反对林彪、对林彪的诬陷等等。过了几天,“造反派”就在大院里批斗傅连璋,还给他戴上高帽游院示众。在批斗中,傅连璋的“罪名”上升为“三反分子”。

8月28日,傅连璋向毛主席写信求救。9月3日,毛泽东作了批示:“送陶铸同志酌处。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陶铸接到信和批示后,立即通知总政治部负责人,要他们按毛主席的批示,对傅连璋加以保护。林彪一伙对毛泽东的批示根本不予理会,更不买陶铸的帐。没有“大

罪”,总是还有罪吧,既然是“似应”,就不是肯定的,可以保护,也可以不保护。

9月5日,中华医学会的“造反派”在邱会作的支持下揪斗傅连璋。70多岁的老人,脑袋被打得鲜血直流,肋骨也断了好几根。

1966年11月,总后秘密成立“傅连璋专案组”,编写傅连璋的罪行材料,罗织了六大问题,100多条罪状。还拟了《关于批判傅连璋三反言行的报告》,送交中央军委。

傅连璋仍寄希望于毛泽东,12月12日,他又一次给毛泽东写信。12月18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前后送来各件都看到了。政治安排问题,很多人同样。现在还谈不到,等将来再说。”批完后又加一段:“对自己的一生要有分析,不要只见优点,不见缺点。”两次批示,傅连璋都不知道。

1968年1月,康生炮制了安子文设特务电台的罪状,把傅连璋也牵连进去,说他把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健康情况报送安子文,由安子文通过电台发给香港特务组织。于是,傅连璋又被扣上“特嫌”帽子。3月13日,江青听取8个专案组的汇报,谈到傅连璋的特殊问题时,她勃然大怒:“傅连璋这个家伙竟敢把毛主席的健康情况向外扩散,应该把他抓起来。”14日凌晨,总后的一群“造反派”到香山新村砸傅连璋家门,将他们夫妇拖下床,赤脚站在地上冷得发抖。傅连璋被关进秦城监狱,穿上6847号四衣,关进牢房。

3月29日上午夜时,看守打开牢门,只见傅连璋躺在水泥地上,身体已冰凉僵硬了。手腕上还戴着手铐,血迹斑斑。

毛泽东逝世前一年,于1975年5月17日批示:“傅已入土,呜呼哀哉”,“应予以昭雪”。随后,解放军总后勤部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安灵仪式。